

颠覆或妥协？

——19 世纪英国“新女性”形象塑造的困境

杜欣霓

【摘要】 在 19 世纪末的英国，父权社会导致女性形象是在男性凝视下塑造的。为了反抗这种符合男性利益的、单一的形象塑造，“新女性”应运而生。该形象中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与不一致性：一方面，她们思想自由、独立自主，对婚育兴趣不大，敢于直白表露情欲并追求权力，对“家庭天使”形象及男性的支配性地位构成挑战；另一方面，她们在对情欲、母性职责、权力的疑问中屡陷困境，被迫向父权传统妥协或接受惩罚。“新女性”拒绝男性凝视，却在父权社会中找不准女性定位。因此，这是对女性身份重塑的一次不彻底的尝试，女性如何从父权制中突围依然悬而未决。

【关键词】 女性形象 新女性 家庭天使 男性凝视 母性职责

【作者简介】 杜欣霓，云南财经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 - 1125 (2023) 01 - 0125 - 15

“妇女问题”是整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核心问题，由于男性占据社会支配地位，因而这一时期的女性成为被男性凝视和再现的对象，女性形象的塑造中承载着以男性为主宰的社会的投射。中产阶级女性被塑造成“家庭天使”，具有纯洁、柔弱、顺从的特征，甘于奉献和自我牺牲成为女性理想气质的最佳写照。然而，随着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与父权制式微，女权主义运动于 19 世纪中后期兴起，不断与传统的父权制思想进行博弈，思想进步及经济独立逐渐催生了一批“新女性”——她们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并受过一定教育，大多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渴望男女平等，敢于主动追求情欲、掌控权力，走入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去参加就业、推动慈善事业；她们试图抵制男性凝视对女性的单一定位，与传统的“家庭天使”角色割裂开来，重塑女

性形象。英国在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小说，专门描绘了这些特立独行的“新女性”。

支持和反对“新女性”的声音都不绝于耳——有部分男性支持女性独立自主并取得成功，但也有很多女性强烈抗议女性解放，指责其会对婚姻和母亲身份造成威胁。在社会主流媒体的描述中，“新女性”要么是聪明、独立、自主、会骑自行车的现代女性，要么是放荡、反常、男子气、烟不离口、讨厌孩子的堕落女性，但不管是被欣赏还是被鄙视，“新女性”引发的热度都足以挑战“家庭天使”多年来的垄断地位。她们与社会期待的女性形象大相径庭，既颠覆了“家庭天使”的扁平形象，也对男性的支配地位和父权制社会秩序发起了冲击，甚至被视为对英国社会稳定及帝国霸权地位的严重威胁。

一、自我认同危机及定位的不确定性

“新女性”之所以诞生于维多利亚时代，首先源自中产阶级女性对“家庭天使”定位产生的身份危机感，这种危机感迫使她们为了抵制男性凝视而重新定义自我。

在父权制根深蒂固的影响下，当时的英国社会是一个严格确认并区分性别身份的社会，男尊女卑的定位已成为不言自明的社会准则，这种性别意识形态规定了男女之间差异的先天性及重要性，确立了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制度、角色分工及性别身份。^①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倡导积极进取、自我奋斗及自强自尊精神，明显偏向于男性气质，按照当代著名男性研究学者康奈尔对男性气质的划分，这属于“支配性气质”，体现出“目前最广为接受的策略”，便于男性在当时男尊女卑的性别模式中取得领导地位。这一时期的女性气质则表现为温柔娴静、顺从谦卑，与支配性的男性气质恰好对立，因而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中产阶级男性作为一个整体，可以从女性对他们的依附中获取所谓的父权红利。^②

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对家庭的器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尤其对中产阶级而言，家庭成为男性逃避外界、安享私人生活的场所，却也是女性的责任之地。“家，甜蜜温馨的家”成为一种理想，家庭不仅象征着爱、舒适与宁静，更被赋予了崇高的道德和精神力量；男性在公共的社会领域打

^① 参见陆伟芳：《论19世纪英国社会性别角色观念》，《思想战线》2005年第4期，第115页。

^② 参见[美]R.W.康奈尔：《男性气质》，柳莉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106页。

拼，女性在私人的家庭领域打理，在男女分域而治的前提下，家庭成为女性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地。家庭理想的重要倡导者艾利斯夫人指出，女性不仅要运用家政管理技巧将家庭打理得体面、舒适，还需要胜任道德重任、投入崇高善良的情感，使家庭成为坚实的壁垒。^① 艾利斯夫人积极倡导女性将心中潜藏的道德能力、同情心和善心付诸实践，通过完成家庭职责来造福社会，她的思想对中产阶级女性产生了深远影响。考文垂·帕特摩于1854—1862年发表了《家庭天使》组诗来歌颂女性，从此，家庭天使化身为爱丈夫的妻子和爱孩子的母亲，这一意向完美契合了艾利斯等人笔下的理想女性形象，因而很快流行起来。著名思想家约翰·罗斯金在《芝麻与百合：关于男人、女人及生活的艺术》中指出，女性可以利用自己对智能和地位的敏感来保护自己，女性的统治地方即为家庭，家的本质就应该是“一个避难所、一块和平地”，女性的聪敏是为了“更好地自我奉献”，是为了“永远陪在丈夫身边”。^② 中产阶级女性作为“主人”被塑造成“家庭天使”的形象，这一形象寄托着社会尤其是男性对家庭的美好想象。19世纪30年代以后，主流期刊中歌颂女性道德优势的文章数量增加，至19世纪50年代时，几乎能在所有有关女性地位的报道中找到对“家庭天使”理念的颂扬。^③ 主流媒体的宣传造势使女性形象从过去的引诱者转变为救赎者，这种做法颇有神圣化女性之嫌，使女性成为无私奉献和高尚道德的化身。

在20世纪中叶之前，贝蒂·弗里丹所述的“女性的奥秘”是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性属话语，女性的生理特征决定了女性柔弱依附的性属特征、贤妻良母的性属定位及男尊女卑的性属关系。^④ 中产阶级女性的“家庭天使”定位印证了弗里丹的上述论断：其一，她承载着持家理想，女性有责任营造并管理一个舒适的和平圣殿，避免外界的恐惧、猜忌、分裂，让男性能享受自然真诚的家庭生活；其二，她承载着道德理想，社会对道德水准的要求延续到女性身上，女性成为道德典范，应具备贞洁、高尚、温柔等基本品质，妻子要以维护家人道德品质为己任；其三，家庭天使还承载着生育理想，女性最主要的职责是生儿育女，为社会的持续繁荣培育后备力量。同时，“家庭天使”理念的盛行限制了女性的活动范围，企图将她们禁锢在家庭这个私

① 参见傅燕晖：《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早中期家庭意识形态探析》，《北方论丛》2017年第2期，第106页。

② 参见[英]约翰·罗斯金：《芝麻与百合：关于男人、女人及生活的艺术》，王浩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77~79页。

③ 参见Julia Bush, *Women against the Votes: Female Anti-Suffragism in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80.

④ 参见韩海琴：《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男女间性——马丁·艾米斯小说性属主题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16页。

领域，以保持女性美好品性不受外界侵扰为由，剥夺了女性进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公共领域的机会。

在19世纪的英国，各种社会激进运动和改革运动使自由主义传统、启蒙思想及自由平等思想得以进一步宣传，启发了女性的心智。^① 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随着女性教育的普及、女权主义运动的深入以及女性自我意识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女性对固化的“家庭天使”形象产生了认同焦虑。“家庭天使”的纯洁性不但漠视了女性的真实需求和欲望，其对女性道德使命的过分强调更是严重阻碍了她们进入政治经济领域，不利于女性充分发挥才干；女性被凌驾于道德领域的至高地位上，却没能享有相应的实权和法律保障，经济独立性的丧失进一步恶化了她们在两性关系中的劣势处境。同时，男女比例失衡、中产阶级婚恋成本高等加剧了中产阶级女性寻觅婚姻的焦虑，单身女性难以完成成为贤妻良母的社会使命。所以，实践中的重重限制与困难让女性难以发自内心的认可自身价值，对“家庭天使”这个完美形象产生了认同焦虑，自然就会出现社会意向和实践之间的割裂。

父权制社会对女性气质的构建是基于男性凝视视角的，这种符合男性利益的构建方式导致了其对女性定位的单一性，具备柔弱、顺从、被动、隐忍、自我牺牲等品质的就是“天使”；反之，具备强势、反抗、破坏、淫荡等特征的就是“魔鬼”。二元对立视角忽略了女性本身的主体性，这种女性气质“建立在女性对男性臣服的语境之中”。^② 当中产阶级女性意识到父权统治的压迫时，就会对自己长期以来的失语状态产生严重不满，为了避免失去自身主体的存在感，她们迫切需要在环境中重建自我，并且将塑造出和男性期待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当作一种对抗方式。因此，“新女性”首先要将自己同“家庭天使”割裂开来。“新女性”是女性定义自我的一次尝试，女性不再任由男性来指定她们的社会角色，而是自己把握话语权来完成自我定义。

社会上对何谓“新女性”并没有做出统一的权威性定义。有学者提出，但凡是拒绝传统女性角色、挑战公认的婚姻和母性职责、以工作谋生或是以任何方式为女权主义事业辩解的女性角色都可以被认定为“新女性”。1894年，《北美评论》中首次出现了“New Woman”一词，“新女性”被视为在道德上比男性稍高一等的人。^③ 主流媒体多以嘲讽口吻对待“新女性”，《笨

① 参见陆伟芳：《近代英国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124页。

② 参见韩海琴：《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男女间性——马丁·艾米斯小说性属主题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16页。

③ 参见 Sally Ledger, *The New Woman and the Crisis of Victorianism*, in Sally Ledger and Scott McCracken, eds., *Cultural Politics at the Fin de Sièc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2.

拙》杂志将她们描述为苦闷、受过过多教育而永远被困在书架上的老处女，社会评论家马克思·诺尔道严厉谴责她们是一群摒弃传统、越来越男性化的人，伊莱莎·林顿讽刺“新女性”和浪荡子同属于对原本性别去性别化的怪胎。1895年，“新女性”、颓废派和花花公子都被卷入因王尔德入狱所引发的风暴中，同年12月21日，《笨拙》杂志刊登了《“新女性”的终结——崩塌终于到来》一文。

“新女性”在小说中则呈现出更加丰富的样貌，文学作品中早期的“新女性”形象包括：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在与丈夫决裂后离家出走；席莱纳《非洲农场故事》中的林德尔，有过婚前性行为及婚外孕的经历；哈代《丛林人》中的格蕾丝，受过优等教育而智识过人，与周围人格格不入。她们身上体现了“新女性”的特质：崇尚自由、独立自主，受过良好教育，对婚姻和养育子女兴趣不大，敢于直白表露感情和性欲。与“家庭天使”身上体现的确定性和一致性不同的是，“新女性”形象从来都不是高度一致的，作家们也从未对何谓“新女性”达成统一标准，文学作品中的意识形态投射和社会实践之间也存在着较大差距。可以说，在崇尚确定性的维多利亚时代，“新女性”身上的不确定性就是一种对社会主流思潮的挑衅，它的可贵之处在于颠覆了社会既定的性别秩序和性别气质。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新女性”在重新定义自我时并没有完全摆脱男性凝视，她们对自身道德优越性的强调既符合男性对女性保持良善、高尚的期待，也契合了传统的两分领域论对女性道德使命的要求，“新女性”的“新”并不意味着和传统定位彻底割裂，而是在不断调试中寻求平衡，在有限的突破中寻求认同。

二、“新女性”的情欲困境

在19世纪的英国，男性霸权作为一种观念和社会行为渗透到社会及家庭生活的多个领域，在婚姻关系中，法律明显偏袒男性的权利，女性不再作为独立个体而存在，妻子生活在丈夫的监护下，法律规定丈夫可以拥有妻子的身体和财产。^①面对这种不平等境遇，“新女性”反客为主，通过对情欲的大胆诉求来宣告女性对自我身体的支配和对从属地位的拒绝。

维多利亚时代崇尚道德制约，将女性贞洁视为其道德优越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的贞操成为衡量其道德水准的绝对标尺。维多利亚女王既是女性纯洁的象征，又是完美婚姻家庭生活的典范：她不仅是地位最优越的女性，

^① 参见潘迎华：《19世纪英国现代化与妇女家庭法律地位的演变》，《世界历史》2007年第6期，第7页。

而且是贤妻良母，与丈夫感情甚笃并养育了9个子女，为社会树立了道德风尚标杆。当时，婚前性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女子婚前失贞等同于道德沦丧，意味着丈夫可以随时抛弃她，她将永远失去幸福的权力。整个社会对女性道德的严苛要求还体现在对女性的性需求漠不关心上，医学界甚至将女性的情欲需求和道德品质联系起来，认为一个谦逊的女人很少考虑自己的情欲是否得到满足，她顺从丈夫只是为了取悦他并完成生育职责；女性不能有欲望，但在丈夫需要时也不能排斥。在维多利亚时代，性话语是种禁忌，甚至有教养的人、上流社会女性都避免使用性语言及与此相关的邪恶语言。^①

尽管整个时代以性压抑为特征，但要彻底根除对性的讨论是不可能的。根据福柯的观点，在维多利亚时代，性意识非但没受到压制，反而受到激励，进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与迷恋；维多利亚时代用来压制性的各种机制、律令、道德都统一构成了性的权力话语，这种话语兼具压制性和生产性，否定性和肯定性，排斥性和鼓励性。^②文学作品中的“新女性”一反以往女性内敛的禁欲形象，毫不避讳对情欲的诉求，女性不再是只为取悦男性而存在的客体，而是成为奔放甚至是贪婪地追求情欲的主体。玛丽·科雷利在《撒旦的悲哀》中把“新女性”塑造成性感且放荡不羁的角色，书中的西比尔如同邪恶的秃鹫，她强烈的欲求令丈夫感到恶心和恐惧，她在自杀遗言中将自己的道德堕落归咎于读多了爱情小说的负面作用。乔治·埃杰顿在数篇短篇小说中为女性勇于满足自己的情欲而欢呼，她将自己两次结婚、一次离婚、一次丧偶并有一系列婚外情的真实经历写在了故事里。波伏瓦曾指出何谓女性性欲正常而成功的发展，即“在爱情、温情和肉欲方面，女人成功地克服自己的被动性，并与性伙伴建立一种相互关系”。^③她将自我和他人在情欲过程中的相互承认视为一种实现了两性平等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女性”能突破维多利亚时代性压抑观并主动追求自身情欲的满足，无异于是对两性平等关系的一次大胆探索。

女性在表达情欲的同时，也在质疑婚姻的意义是否被夸大了。萨拉·格兰德在《贝丝之书》中大胆探讨，如果年轻女子放弃追求学识，转而寻求有利的婚姻，这是否会带来不幸；哈代的《无名的裘德》中，苏怀了裘德的孩子，即便冒着未婚生子被社会唾弃的风险也拒绝嫁给他；乔治·吉辛在

① 参见姜德福、梁月：《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整肃——以〈帕尔摩报〉“现代巴比伦的少女献祭”系列报道为中心》，《史学月刊》2019年第4期，第86页。

② 参见张智义：《维多利亚时代的性意识和女性作家写作》，《外国语言文学》2014年第4期，第264页。

③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70页。

《畸零女人》中展示了两种女性的不同追求，一种追求完美的婚姻，另一种则追求教育、就业和独立；艾伦·格兰特的《敢作敢为的女人》讲述了女主人公未婚生育的经历，展示了自由恋爱会给经济上不独立的女性带来怎样的风险，她认为婚姻是一种堕落。这一婚姻观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立刻引发了巨大争议，女性主义运动领袖福西特夫人在书评中首先撇清了主流女性主义和任何形式的性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她指出，艾伦试图将妇女对公民独立身份的要求建立在对婚姻、家庭的抨击上，单就这一点来看，艾伦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关系是敌对的。^①

但是，思想前卫的“新女性”并未完全脱离传统道德观的审判，她们要么最终向既定的母性职责妥协，要么因越轨行为受到残酷的惩罚，这种前卫与守旧并存的不一致始终存在于她们的形象塑造中。在布莱姆·斯托克的小说《吸血鬼伯爵德古拉》中，露西身上就含有这种矛盾性。在受吸血鬼德古拉引诱之前，露西就坦露过自己想要同时拥有三个丈夫的欲望；在被德古拉咬过之后，这位天真的金发女郎变成了丰满而妖娆的吸血鬼，为了满足欲望而卖弄风情，并以吸食幼儿的新鲜血液为生，其彻底丧失母性的形象是作者对社会中“新女性”的一次拙劣戏仿。然而，露西的形象并不拘于放浪形骸的一面，她的思想中也有保守的一面，她认为男人是高贵的，而女人根本配不上男人；^② 好友米娜也多次称赞露西温柔体贴。露西变成吸血鬼后的结局是血腥而凄惨的，她在丈夫和朋友们的注视下，被象征着父权的医学博士范海辛以木桩刺穿心脏而丧生，这种惨死成为对她纵欲的终极惩罚。相比较而言，米娜聪慧、美丽、独立，更符合维多利亚时代对女性的期待，虽然她也一度受到吸血鬼的引诱，但她没有旺盛的情欲，在受到诱惑后能重新醒悟，愿意在婚姻中扮演尽职的妻子，因而免除了可能的惩罚。

三、“新女性”的母性职责困境

19世纪末，进入“帝国时代”的英国不断提升其在海外殖民地的影响力。对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而言，女性的作用不容小觑，她们以护士、传教士、教师等身份远赴殖民地，从事看护伤病、推广慈善活动、传播英国文化及基督教等工作；另外，出于帝国不断扩张的需要，整个社会进一步强调女

^① 参见 Julia Bush, *Women against the Votes: Female Anti-Suffragism in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82.

^② 参见 Sara Schoch, *Gothic Monsters and Masculinity: Neutralizing the New Woman in Victorian Gothic Literature*, *Explorations: The UC Davis Undergraduate Research Journal*, Vol. 15, 2012, p. 14.

性的孕育职能，她们需要繁衍、培育后代，为稳固帝国霸权培养源源不断的储备人才。因此，优生优育成为女性介入公共领域的一个渠道，这意味着她们可以在不挑战两分领域观的前提下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对传统婚姻家庭生活及生儿育女不感兴趣的“新女性”则被视作异类——以《笨拙》为代表的社会主流期刊经常将“新女性”刻画成性欲旺盛或没有女人味的畸形产物。与这种单一论调不同，小说中的“新女性”对于母性职责的态度存在不一致之处：一方面，她们可能自私自利，排斥成为母亲；另一方面，她们也可能清晰认识到孕育后代的重要性，不会因为情欲需求而忽略母性职责。

哈格德在一系列小说中就通过妖魔化女性的强大来指责她们在母性职能方面的不作为。哈格德在几部小说中都刻画了母系社会中女性的至高权力，她们与男性平起平坐，而且不听命于任何男性；她们既不知道也不在乎自己的父亲是谁，向来不把男性权威当回事；她们爱慕一个人就会公开拥抱他，如果男方回吻并表示愿意接受她，则象征着夫妻关系的开始，一旦一方觉得厌烦便可终止。^① 在《她》中，女王阿莎不但直截了当地向情人表白，更是当着他的面残忍地杀死了情敌。^② 在续集《阿莎归来》中，阿莎与邻国女王为了争夺美男子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终，阿莎凭借自己的超自然力量摧毁了整个邻国。在作者看来，这些女性空有一副女性的皮囊却不履行生育职责，甚至要戕害具备生育能力的其他女性，这种毁灭欲与女性善良、温和、甘于奉献的天性是相悖的，是对女性母性本职的亵渎和对帝国稳固的妨碍。

“新女性”小说中不乏宣扬“优生”“种族”等理念的，部分“新女性”小说甚至和主流女性主义运动难得在母性职责、优生优育方面达成了共识。例如，萨拉·格兰德在小说《天生一对》中批判了英国1864年颁布的《传染病法案》，该法案为了防止性病肆虐，责令港口城市与陆海军驻地附近城镇的警察逮捕妓女和疑似妓女并强行体检，一旦发现传染病者就要立即强制关押进性病医院，而经常召妓导致携带疾病的男性却逍遥法外。法案将性病肆虐归结于女性道德有亏、堕落无耻，而男性嫖娼只是因为没经受住诱惑。格兰德不满社会对男女采取的双重道德标准，便塑造了埃瓦德妮这位“新女性”。她学识渊博，学习过解剖学、生理学，读过约翰·密尔的《妇女的屈从地位》；当她在婚礼当天发现丈夫的可疑性史后，果断拒绝完婚。然而，埃瓦德妮并非单纯为了自身健康考虑而拒绝完婚，她更担心的是无法孕育出健康的孩子，与其说她压抑了自己的情欲，不如说她是在遭受无法履

① 参见 H. Rider Haggard,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eterborough: Broadview Press, 2006, p. 94。

② 参见 H. Rider Haggard,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eterborough: Broadview Press, 2006, p. 191。

行母性职责的痛苦。和埃瓦德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书中另一位女性伊迪丝，她坚持为患有梅毒的丈夫生下孩子，导致孩子一出生就携带病毒、孱弱多病，最终死于痴呆。这显然不符合科学原理，但作者描述这样的情节是为了强调优生优育的必要性。格兰德认为，正常女性进行性生活的主要目的是尽母性职责，而不是满足女性本能；她在 1896 年发表的文章中多次谈到婚姻中母性的重要性，强调“性净化运动”对繁衍后代的必要性。格兰德抨击社会对男女采取的双重道德标准，她认为男性应该效仿女性，提升道德优越性，但女性不应该拥有男性的道德自由度。

萨利·莱杰认为，对优生优育的重视在小说《盖莉亚》中体现得更为直接。女主角盖莉亚一直希望自己未来孩子的父亲健康、强壮、充满男子气概，她认为如果自己的价值只体现在繁育后代上，那么她就要充分发挥这种价值，不会让诸如爱情之类的其他因素干扰她实现自我价值。可惜，盖莉亚喜欢上一个患有心脏病的男人，最终她抑制住了对心上人的渴求，转而嫁给了一个没什么感情却身体健康的男人。^① 这种以优生学逻辑来选择婚配的做法，甚至比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讲求门当户对的婚恋观更为理性。在 19 世纪末的帝国时代，强调女性孕育纯粹、强健的种族的必要性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这种共识具有很强的同化性和渗透力，甚至一度超越了由阶级、性别、意识形态不同而带来的分歧和对立。

波伏瓦在考察了生育、生理期等女性性别特征的属性后，对女性在体能、力量等方面逊色于男性持悲愤态度。她将女性身体看作是内在的异化，认为怀孕、分娩和月经消耗了她们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潜能，从而被禁锢在肉体 and 内在性之中，而男性则不会受到这种固有的生理功能的束缚。^② 另外，波伏瓦指出，让女性通过母性实现两性平等的企图是一种欺骗，女性成为妻子、母亲的身份是建立在结婚生子这个前提之下的，女性身份依旧隶属于丈夫支配之下。^③ 在提及婚姻的意义时，她认为，“婚姻对于男人和女人，向来都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④ 男性凭借婚姻寻求自己生存空间的扩大并再次确认了自己的主体身份，女性却被划分到延续物种和照料家庭

① 参见 Sally Ledger, *The New Woman and the Crisis of Victorianism*, in Sally Ledger and Scott McCracken, eds., *Cultural Politics at the Fin de Sièc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5.

② 参见方珏：《异化与自由——波伏娃女性主义哲学的启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主办：《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4）》，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28 页。

③ 参见 [法] 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 II》，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57 页。

④ [法] 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 II》，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00 页。

的任务中，传统的婚姻关系制约了女性的超越性，即便女性有了工作，也常常需要“在对职业的兴趣和对性生活的操心之间抉择，她很难找到平衡，如果她要实现平衡，代价是做出让步、牺牲，使出杂技的功夫”，“从痛苦的处境中”投入职业生涯的女人依然“受到女性身份传统上带来的负担的奴役”。^①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女性应该摒弃传统婚姻的制约。女性要实现自我和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是取得经济独立与自由，女性需要通过工作来实现独立谋生的目的，需要成为像男性一样的生产者来实现自己活动的创造性、超越性。在“新女性”形象构建中，并未对母性职责可能造成的束缚进行反思，没能将女性的经济独立自主权置于首位考量，而是通过完成生育功能来实现女性地位的提升、履行为帝国繁衍后代的职责，与波伏瓦所述通过工作实现女性活动的超越性、创造性相去甚远，这是其形象构建中保守性的典型体现。

四、“新女性”的权力困境

“新女性”除了在感情表达方面大胆、直接，也毫不掩饰自己对权力的渴望和掌控。占据社会支配地位的男性早已习惯于凌驾在女性之上，习惯于女性只是作为服从、奉献甚至牺牲的客体，因此当女性流露出权力欲，或者表现得比男性强悍时，男性会将其权力的获得视作是不合理的，并以妖魔化女性的方式来贬损她们，告诫女性一旦权力欲膨胀，就会给自身、社会、整个大英帝国带来灾难。

首先，主流男性话语对女性的权力来源总是含糊其辞。19世纪有“科学的世纪”之美誉，科学理性主义精神享有崇高地位，然而当时的学者却将科学视为由男性经营、主导的事业，这种理性至上的思想根植于二元对立的性别神话中，意味着男性即理性、客观、真理，女性即感性、主观、偏见。因此，当男性无法从科学角度来解释女性的权力来源时，就会将其视作秘密、巫术或禁忌。在哈格德的《她》中，阿莎女王是女人、女神、女巫三重形象的结合，有着绝世的美貌、智慧及法力，然而除了知道她侍奉的是象征母性与繁殖的伊西丝女神，没人能说清她的权力或神力究竟是怎样获得的。阿莎的子民告诫外来者霍利，任何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于女王，她虽然没有正规的军队，但她至高的法力根本不需要军队的保护，但凡质疑她的权威或是背叛了她，无异于自寻死路。^②男性向阿莎跪拜的环节在小说中多次

^① 参见 [法] 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560~561页。

^② 参见 H. Rider Haggard,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eterborough: Broadview Press, 2006, p. 100。

出现，来自文明世界的霍利一开始坚决不向阿莎跪拜，但在一睹其美貌后，他自觉双膝瘫软，深深拜服，承认是她的美貌令自己诚心跪拜。在续集《阿莎归来》中，来自父权社会的男性再次虔诚地拜服在重生的阿莎面前，这次跪拜时霍利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心理挣扎，也不是敷衍地完成礼仪，而是匍匐在地甚至去亲吻阿莎的脚。在《吸血鬼伯爵德古拉》中，当范海辛发现露西的癫狂状态时，作为医学博士的他并没有以科学的方式来诊断病因，而是断定她中邪了。范海辛的迷信透露出他对科学这一权威话语的不自信，他宁肯相信露西力量的猛增是因为妖魔，也不肯探寻其他更理性客观的可能。范海辛用大蒜、圣水来驱邪，为露西注入健康男性的血液来净化其身体，与其说这是科学的治疗手段，不如说这是毫无理性可言的驱魔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在范海辛尝试救治露西时，他的第一个“求助对象”是女性米娜。在得知米娜记载了露西和吸血鬼的相识过程后，他立刻向米娜借日记，企图通过她的记录来诊断病情。殊不知，米娜是用速记写日记的，她毫不犹豫地借出日记，存心要捉弄他一下；只有当范海辛再次恳请米娜解读速记符号时，她才出于一丝愧疚去答疑解惑。有评论家认为，米娜的恶作剧赋予了女性“故事把关人”的关键角色，即只有透过她的过滤和解释，男性才能得知完整的叙事。^① 在这里，男性轻易向女性求助、示弱，显示出象征父权的科学理性主义以及男性支配气质的式微。

其次，男性除了对女性的权力来源含糊其辞，还对女性取得权力的手段持怀疑态度，女性消解男性气质的方式不外乎是通过美色诱惑或歪门邪道，难登大雅之堂。女性色诱男性，使男性丧失判断力和自主性的情节反复出现。^② 在《她》《阿莎归来》中，无论是一向不近女色的中年男性霍利，还是早已心有所属的青年男性利奥，都拜倒在了阿莎女王的石榴裙下；阿莎深知自己的魅惑力，自称“凡是一睹我美貌的人必定念念不忘”，^③ 甚至在她残忍地杀害了利奥的心上人后，也深信自己仅凭美貌就足以让利奥完全丧失报复的念头，转而爱慕迷恋起她来。^④ 在《吸血鬼伯爵德古拉》中，乔纳森在明知对方是女性吸血鬼的情况下，依然沉沦于美色无法自拔。他描述第一次遇到女性吸血鬼时，内心的渴望和致命的恐惧被同时激发起来，他甚至

① 参见 Sara Schoch, *Gothic Monsters and Masculinity: Neutralizing the New Woman in Victorian Gothic Literature*, *Explorations: The UC Davis Undergraduate Research Journal*, Vol. 15, 2012, p. 8.

② 参见张金凤：《“他者”形象与世纪末焦虑症——解读哈格德的〈她〉》，《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94~95页。

③ H. Rider Haggard,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eterborough: Broadview Press, 2006, p. 153.

④ 参见 H. Rider Haggard,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eterborough: Broadview Press, 2006, pp. 211-212.

“静静地躺着，心里充满了强烈的期待”，当对方逼近时，他将皮肤上所感受到的吸血鬼的呼吸描述为“有如蜜糖一样”。乔纳森同时感受着情欲的放纵和死亡的威胁，当吸血鬼尖利的牙齿停在他脖子上时，他只是“闭上双眼，在难以言述的感觉中等待着，心怦怦直跳”，^① 女性全程掌握了主导权，在勾引和残害男性的过程中都是咄咄逼人的主导者和侵略者，这是对性别规范的颠覆，迫使男性降低到从属地位，而女性所用的手段却如此原始低劣。《吸血鬼伯爵德古拉》中的吸血鬼伯爵形象具有雌雄同体的特性，“他”结合了男性的力量和女性的繁殖功能，通过吸血将原本端庄自持的女性异化成冷酷、淫荡的怪物。然而，这种繁衍方式破坏了自然界的正常规律，“他”本身又不必承担生育过程中的任何母性职责，这种诡异的繁衍方式是有悖伦理的。范海辛嘲笑吸血鬼并不具备“人类完整的大脑”与正常的智慧，吸血鬼所谓的胜利不是凭借正当手段，而是靠引诱、腐化等歪门邪道得来的。^②

在质疑女性的权力来源和手段后，新的疑问自然就来了：女性拥有权力是合情合理的吗？在绝大多数的“新女性”小说中，女性拯救男性的情节会反复出现；在男性话语中，如果这种权力用来拯救男性，那么女性即便拥有了权力，身上也依然保留着“家庭天使”的可贵美德，这就为她们掌权提供了部分合理性。但是，一旦权力被用来满足女性私欲，既会毁灭男性的独立、尊严、价值，颠覆社会的既定秩序，也会吞噬女性自身并带来灾难。上述两种情况都在哈格德的小说中得到了印证：女王阿莎显然不是传统小说中等待男性救赎的弱女子，她数次拯救了两位来自文明世界的外来男性。尤其在《阿莎归来》中，当两个部落的女王开战时，阿莎要求情人利奥躲起来以保证安全，但利奥出于男性的自尊强行上了前线，很快就被敌方的女王以诡计掳走了；阿莎得知后勃然大怒，立即召唤了可怕的暴风雨向敌方发起了毁灭性的打击报复，导致敌国尸横遍野。在这里，性别的倒错叫人忍俊不禁，不管这里的男性多么软弱无能，他们的美色都成了女性争夺的唯一战利品。而阿莎作为拥有至高权力的女王，其权威的最大用途仅仅是用来保护心上人，这里的权力运用充满了母性的慈悲，强势的女性身上依然投射了男性对“家庭天使”的渴望，阿莎一再被称为“mother”的意义也不言而喻。然而，当阿莎执意要去英国推翻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为心爱的情人夺取王位时，多次受其庇佑的利奥再也无法直视女性的强悍了，他认为这个“可怕的

① 参见 [爱尔兰] 布莱姆·斯托克：《吸血鬼伯爵德古拉》，韩啸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3~34页。

② 参见 Sara Schoch, Gothic Monsters and Masculinity: Neutralizing the New Woman in Victorian Gothic Literature, *Explorations: The UC Davis Undergraduate Research Journal*, Vol. 15, 2012, p. 12.

女人”去夺权产生的后果令他“不寒而栗”，“她的狂傲和野心会冲破一切束缚，恣意妄为……必要时她定会不择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①可见，当女性的权力欲远远超出了母性职责的范围时，男性也就不再将其视作母亲或伴侣，而是任其自我毁灭。最终，美艳绝伦的阿莎在永恒之火中被毁灭，变成了猴子般皱巴巴的老怪物。哈格德在对待“新女性”的权力欲时表现得极为矛盾，他既赞颂女性神秘而伟大的力量，又憎恶并妖魔化掌权的女性。

“新女性”对权力的热烈渴望和强劲掌控无异于是给了父权社会一记重击，不论这种权力欲带来的是创造性或是毁灭性的后果，都削弱了男性的支配性气质和长期以来的优越感。

五、“新女性”与女性主义运动的关系

作为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对抗认同焦虑、挑战男性凝视的产物，“新女性”身上的叛逆精神充满了生命力，颠覆了女性在身份建构、情欲表达及权力追求方面的被动地位，打破了女性形象塑造中非“天使”即“魔鬼”的僵化模式。“新女性”极大丰富了女性身份的内涵，使女性不再刻意压抑自己的真实欲求、不再被动等待男性的救赎、不必屈从于男性统治和霸权。然而，“新女性”的颠覆性是有限的，未达到“运动”的规模 and 影响，其对争取女性自由、平等的向往与女性主义运动的宗旨是契合的，但远未达到后者的全面性和深入性。

诚然，“新女性”形象的构建和小说的流行密不可分，小说可被视为一种抒发女性心声的渠道，凝聚着创作者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在虚构的文学世界中重写女性命运也是一种对现实的抗争。通过报纸、小说等各种印刷品，社会得以探索和讨论女性气质的新表现形式，这种探讨为发动社会变革提供了更为开明的舆论氛围。“新女性”小说在表现女性方面有一定的自由度，但也存在不少障碍，传统女性气质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任何对女性进行新定义的尝试。19世纪80—90年代的“新女性”小说中描绘的女性形象是混合性的，突破与保守同步存在，这正好反映出在社会动荡时期性别身份的转变会呈现何等样貌。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融合了传统家庭女性特质和新兴现代女性特质，女性拥有了表达感情和情欲的一定自由，女性可以是自由、大胆、奔放的，但善良、甘于奉献的传统气质始终是其核心。另外，承认了女性的独立以及工作对于女性的重要性，妻子和母亲两种角色在女性形象构建

^① 参见 H. Rider Haggard,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eterborough: Broadview Press, 2006, pp. 231 - 233.

中不再是不可或缺的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会完全摒弃成为妻子和母亲的传统理想。因此，“新女性”试图在女性形象构建的过程中达成现代性和传统性的平衡。

1895年，王尔德入狱引发了热议，社会再度质疑“新女性”是否也象征着道德堕落。同年12月21日，《笨拙》杂志刊登文章宣称“新女性”正走向衰亡，随后“新女性”小说在经历了短暂的繁盛后迅速衰落。“新女性”的昙花一现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除了父权制社会传统难以撼动，“新女性”始终在一种孤立无助的境地中发声，在短暂地、爆发性地冲击女性定位之后，便后续乏力，难以取得像女性主义运动那样持续性的胜利。

其一，“新女性”小说对情欲与权力的向往和追求体现出女性对权力的渴望，但她们对权力的探究显得模糊而薄弱，既没有弄清楚选举权的缺失是女性在社会中缺乏政治话语权的关键，也不可能提出女性要争取权益的明确路径，仅仅停留在女性可以掌权的层次。“新女性”看似以激进的态度来发声，但其抗争并没从根源上颠覆父权制，女性未能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彻底决裂。当“新女性”的行为过于偏离社会设定的轨道时，妥协、接受惩罚、死亡成为她们摆脱受压迫处境、反抗男权文化的出路。“新女性”一边拒绝被动接受男性凝视下的保守定位，另一边却在父权社会中找不准女性的位置。因此，“新女性”对女性身份的重塑是一次不彻底的尝试，女性如何从父权制文化的重重阻碍中实现突围依然悬而未决。19世纪末兴起的女性主义运动的全面性远超“新女性”，它涵盖了女性权益的多个方面，涉及普及女性中高等教育、拓宽女性就业渠道、完善法律体制保障男女平权、争取选举权推进女性政治参与等，不但多层次丰富了女性形象的构建，更使得女性权益落到实处，不再停滞于文字中。

其二，“新女性”小说的创作者从未建立起任何统一的阵营，从未提出明确的奋斗目标，从未真正参与并推动社会的民主改革，甚至从未创办专为“新女性”发声的公共刊物；同时，由于缺乏像女权主义运动中芭芭拉·雷·史密斯·博迪尚、艾米丽·戴维斯、埃米琳·潘克赫斯特等目标明确、统领能力一流的中流砥柱，与女性主义运动的规划性和组织性相比较，“新女性”小说只能成为一时风潮，“新女性”形象为现实中的女性提供了参考，却不足以形成推动时代变革的巨浪。

其三，“新女性”小说创作者自身的文学素养和女性意识也远未达到勃朗特姐妹、盖斯凯尔夫人、艾略特等作家的高度，小说的确反映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但小说中洋溢着哥特主义、浪漫主义的极致性，煽情、畸情、奇幻元素的频繁出现使之难登大雅之堂，对大部分中产阶级女性读者来说，猎奇、解闷的意义远大于启示作用。因此，“新女性”小说没能将广泛的中产阶级女性群体凝成合力。同时，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虽然挑战了传统

的女性形象构建，但塑造上远不及传统女性形象饱满，这些形象的结局或是死亡或是回归传统，反映出作者内心的矛盾，作者本身也不确定“新女性”挑战父权社会秩序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吉辛将“新女性”视为“世代的愿景”，只能以层层递进的形式发展：上一代女性以单一的妻子形象出现，仅仅在履行生育职责；当前这一代女性（即19世纪末期的女性）试图为女权主义与父权社会的融合而斗争，但双方都对结果不满；下一代女性肩负着前辈们的希望，她们被抚育成为“勇敢的女性”，能在成长早期就摆脱对父权制度的依赖。^①吉辛所提的愿景是在女性经济独立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的——随着19世纪后期女权运动的发展，以“家庭天使”为代表的传统女性气质定位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19世纪中晚期时，社会上出现中产阶级结婚晚、初婚年龄大、女性独身率高的现象，^②未婚独立女性不仅成为一种逐渐被接受的概念，女性就业机会的增多也成为未婚女性实现经济自主的保障。对于普通女性而言，她们至少可以在依赖和独立之间做出选择，拒绝以婚姻作为女性唯一的出路。就业是女性参与社会互动的最直接途径，中产阶级女性在争取就业、努力工作实现独立的过程中，实现了从家庭无偿劳动者到独立收入拥有者的身份转变，真正摆脱了长久以来“家庭天使”的身份束缚。女性在社会领域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挣得独立收入，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终于和男性实现了精神平等，自食其力让女性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快乐，自尊、自强、自立成为女性新的人生信条。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中产阶级女性的就业属性呈现由蓝领向白领转变的新特点，女性在白领职业中的人数增加，女性在获得经济独立后迈出的改革步伐更为坚定了，她们要求推动女性运动向更全面化的方向演进，以覆盖女性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各项权利。^③19世纪末期的女性主义运动对之后第二波、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争取男女全面平等推波助澜。

因此，虽然“新女性”来去匆匆，但“新女性”对“家庭天使”的消解提升了女性的自省、自觉意识，女性对形象构建的探索不会因为“新女性”的昙花一现而停滞不前。

（责任编辑：陈华积）

-
- ① 参见 Christina Wakeling, *Femininity under Construction: Traditional Femininity and the New Woman in Victorian Fiction*, Thesis for the Master Degree of Arts, University of Manitoba, 2011, pp. 57 - 58。
- ② 参见李宝芳：《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中产阶级的婚配状况》，《社科纵横》2011年第5期，第115页。
- ③ 参见潘迎华：《论19世纪后期英国“白领女性”的兴起与女子教育的发展》，《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100~107页。